

葡月的错位

(一) 21 世纪的破局者与意识形态的合谋

作者：张皓翔

ORCID: 0009-0001-2997-7726

自 2026 年 9 月开始，一场以法国为中心，并迅速蔓延至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等欧洲多国的示威——至少在这里，我们并不认为它称得上革命——活动迅速展开。

这场运动在 21 世纪的今天，用实践再次印证了我们在《资本的当代升维》一书中提出的理论预判：处于教育系统末端、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学生群体，其技能塑造与价值取向已被资本逻辑深度预设与编程，他们处于自身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被系统性剥夺的前沿。这一群体应当被归为无产阶级预备队，或者说准无产阶级；他们在共产主义的实现道路上，充当着殖民逻辑的率先破局者与解放意识的初期点燃者。

同时，这场运动也像一记闷棍，揭露了许多我们此前因理论的傲慢与历史案例的惯性而忽视的问题。这是一场关于 21 世纪革命的前哨，也是我们既有思辨止步的地方。

2026 年 9 月 17 日，法国巴黎东南郊。克雷泰伊圣埃克苏佩里高中的学生与教师，因学校设施老旧、师资资源长期短缺等问题发起了抗议。自此，一场以学生群体为核心、多个利益集团共同参与的动荡拉开了帷幕。到 9 月 29 日，法国高中学生工会联盟（UNL）联合学生联盟（USL）发起了首次全国性封锁行动，并与公共部门工会的抗议交织在一起。到了 10 月初，法国境内千余所高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封锁与停课影响。法国内政部与教育部迅速将其定性为“城市暴力”（violences urbaines），警务部门大肆拘留未成年学生。

极为荒唐的一幕在欧洲这片曾经充斥着革命与激情的热土上重演：镇压性国家机器再次将枪口对准了一群手无寸铁的学生。从 1848 年六月起义中资产阶级共和派对工人与青年学子的卡芬雅克式屠杀，到 1871 年巴黎公社墙下屠夫梯也尔的血腥清算，再到 1968 年“五月风暴”中戴高乐政府用警棍与催泪弹对拉美丁区的清洗——法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时刻以暴力维持秩序——毋宁说维持资产阶级利益秩序——的阶级本能暴露无遗，哪怕他们面对的是一群根本无法伤害统治根基、仅仅希望改善自身生存处境的学生。随着统治阶级暴力手段的介入，运动从最初的示威迈入动荡，这场由资产阶级自身酿成的灾祸，由此从校园扩展到了街头。

10 月 6 日，大学生、教师工会与家长全面接入；10 月 13 日，环保与人权组织加入，学生联盟号召联结“黄马甲”；10 月 17 日至 18 日，极左翼黑块与“黄马甲”融合，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但这并不是任何政治意义上的进步革命。它的真正价值在于，为我们讨论 21

世纪的社会运动与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时代切口。

它的进步意义，在于再次用实践证明了学生群体的准无产阶级性质及其革命前哨的地位。同时，它也暴露了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斗争形式与工业时代的巨大差异，逼迫我们直面许多长期不愿承认的时代矛盾。这次运动，同样呼应了我们在《在罗陀斯的土地上起一曲玫瑰花的舞》一书中的时代化论断：阶级斗争作为地火从未熄灭，但把人们联结起来、让斗争得以显形的引力机制，会随着物质生产条件的改变而迁移。今天的身份政治与新联结是进步但错位的形式，而这一错位的形式，最终将在新的矛盾运动下重新校正回阶级的地基之上。

关于这场运动，当前充斥于爱丽舍宫新闻发布会、主流中产媒体乃至自由派智库中的主导性解释，无一例外地将其定性为“一场社会参与度极广、由多样化诉求交织而成的多阶层抗议联盟”。从法国内政部关于“多元利益冲突”的官方声明，到《世界报》等主流媒体将学生、环保客、传统工会与“黄马甲”撕裂为利益互异的“社会碎片”，资产阶级理论家们精心勾勒出一幅极度复杂的平权与议题平民化图景——而这正构成了他们解释并平息这一运动的意识形态基点。

以这一逻辑为原点的解释，对于资产阶级政府而言，可以名正言顺地将整体性的阶级对抗降维处理为“幼稚而无理的群盲现象”，以强化其作为“公共秩序与理性裁判者”的正当性。这使得资产阶级统治者得以避开自身无法招架的阶级斗争叙事，免于将真正具有力量的广大产业劳动者推向统治阶级的对立面。这套叙事通过“多元”、“身份认同”与“议题平权”，成功将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消解成了多元诉求的极端表达。

而这套叙事，也恰好迎合了参与这场运动的斗争者自身的心理诉求。借助这种“多阶层自发联盟”的叙事，他们可以将自身对政党领导的强烈排斥、对铁的组织纪律的盲目警惕乃至政治割裂的态度合理化；甚至当这场运动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惨败时，这套叙事也为他们提供了完美的免责声明——他们不必去反思自身的幼稚与过错，不必去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不必去研判时代矛盾的运动，大可借此相互推诿，指责是其他群体的利益诉求不一导致了运动的破裂。

这套叙事再怎么八面玲珑、四方美人，它终归背叛了现实。而远离实践，便是政治分析的大罪。

事实上，这场运动绝不是什么多阶层广泛参与的多元诉求联合，而是在 21 世纪物质生产条件高度发展下，无产阶级内部发生深刻分化、诉求趋向碎片化、群体趋向多样化的一次具体体现。由于缺乏科学纲领的引导与先进政党的整合，无产阶级内部难以形成统一的政治意志；加之运动多由未能深入且广泛联系产业劳动者的边缘群体发起，便进一步局限于自身的群体利益，而非阶级整体的核心利益，最终呈现为一场多样化诉求相互交织的错位运动。

我们之所以坚决反对将这次运动看作“多阶层联合”，而坚持其仅仅是无产阶级内部诉求分化的表象，是有着严密的政治经济学依据的。

当下主流的社会分层范式主要依赖两种路径：一种是传统工业时代基于生产资料法律占有权的机械表述，另一种则是韦伯式的财富、地位与权力多元分层范式。然而，随着数字时代数据、算法、平台等新型生产资料复杂占有形式的出现，经典占有论难以描述劳动者“在形式上占有技能与股权，但实质上高度依附于资本”的矛盾状态；而韦伯式的分层范式将财富、地位与权力并置为多元平行标准，在方法论上消解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停留在社会表象的描述——解释不平等却回避剥削，描述分层却模糊对抗，诊断冲突却消解革命。

因此，我们在《资本的当代升维》一书中提出了一套全新的阶级划分标准：

以“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为核心锚点。阶级差异的本质，是“对自身劳动力商品生产过程的自主支配能力”与“对他人劳动力商品生产过程的支配能力”的分配差异。并据此构筑了“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掌控能力—生产完整性—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的三元联动辩证分析框架。

以此标准衡量，本次运动的参与者——从处于劳动力重置末端的学生，到出卖劳动力维持生存的工会成员，再到被边缘化的“黄马甲”群体——在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无一例外地应当归入无产阶级。主流叙事中所谓的“多阶层”，不过是资产阶级学者将社会分工与议题标签误认作阶级壁垒的产物。这本质上是一场披着小资产阶级习气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同出卖了现实条件后的意识形态合谋。

但至少我们必须明确一点：这次行动绝非多阶层的胜利联合，而是一场 21 世纪无产阶级的内部利益诉求分化之后，且同时缺乏科学的纲领与先进的政党领导，忽视了广大产业劳动者的根本力量之后，所展开的一场与资产阶级的斗争。

这场运动的形式极为激进，内核却极为守旧。它高呼“国家只听得懂火光与瓦斯的声音”，高喊“我们没有未来，你们就没有秩序”，却在政治上拒绝阶级认同、拒绝统一纲领，退回了前马克思主义的自发阶段。这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具有着复杂历史背景与新的社会条件下所塑造出来的新的斗争形式，这也正是我们后文所分析的重点。